

婦女與福利爭論

——歐洲社區經驗

李瑞金

倡導女權論者(Feminist)的有關福利論

述不斷地圍繞著三個彼此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即依賴與獨立(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公私二分法(the private public dichotomy)：及婦女有酬與無酬工作的分界面(the interface between womens paid and unpaid work)。福利國家在影響婦女工作和家庭模式方面扮演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所有的福利國家都為婦女提供多種選擇，使她們脫離可能受到剝削的依賴；離開虐待她們的男人；當孩子還年幼又無兒童照顧設施

時、減少工作時間、或者放棄工作；延長接受較高教育的時間；以及在某些國家中，政府機構尚提供公立兒童照顧設施，以便年輕的婦女在工作方面有更多的選擇。再次，少數的婦女今天被迫結婚、或是保持婚姻，好使她們自己和子女有一個生活上的依靠。

婦女不用處在「長期的行賄與脅迫的狀態中」(J.S. Mill quoted in Pateman, 1988: 256)。在福利國家，婦女不僅擁有這些權利和資格；她們也能公開地參與團體行動，進而加強福利規章。其所持的理由是福利國

家已使某種權力受到挑戰，而且它也為婦女提供一個成為自主公民的理由。Pateman (1988:350)指出，婦女已經認為福利國乃是她們獲得生活支持的主要工具，婦女能否成為平等的公民要看她們在有酬的工作上是否有平等的參與。為了照顧家庭成員，婦女要比男性更易於減少、甚至退出有酬的工作。這種情形減弱了婦女成為平等公民的權利。雖然需要照顧的其他家庭成員都仰賴女性的愛及其無酬的勞力，別人依然認為，婦女是需要保護、指導及依賴他人的人。就算她們

個人逃脫依賴他人之名，別人依然會認為婦女們有福利需求上的依賴。

依照 Ellwood (1988) 的看法，輕視一般人的福利反映出現代社會的「公民」價值：自主、責任、工作、家庭及社區。不過，有關福利的批判已超越了美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Fraser (1988:154) 所著之「綜合司法行政治療福利國組織」(comprehensive juridical-administrative-therapeutic welfare state apparatus)，以及法蘭克福學院派對「無父社會」的理念 (Frankfurt School Concept of a fatherless society) 都對「因福利而引起的依賴」表達了類似的恐懼。有人認為，神保佑的福利國家表面上會妨礙，或是不使每個人主動地去照顧他們自己的生活，因而使社會團體變成服務對象團體，專門等待他們分得的一份。況且天佑的國家 (the Providential State) 控制了必然的家庭功能，及扮演父母的角色（主要的是父親的角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扮演了賺取家庭生計的丈夫的角色，卻造成法蘭克福學院派學者們所謂的無父的社會。從這些觀點

看來，依賴福利維生的態度，去平衡民權和義務，去成為非國家的團結模式（補助的），以及組成穩定的賺取生計者的家庭。自從社會主義的「天佑的國家」崩潰以來，此一批判已廣為流傳。

Pateman 說明了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一個難題：例如在風險方面，公民的身分是指，情況類似的人都有類似的經驗。這個理念的背後就是由家庭關係中出來的一般成年男性的生活。然而，他們必須有非公開的方面來促進維持家計者及其子女的福祉。從這個角度來看，福利制度 (Welfare Regime) 和福利混合 (Welfare Mix)、市場、國家、及家務活動的界面，都可以為這個難題提供不同的解答。

就福利國先進的歐洲而言，婦女福利需求的價值和態度、全國福利制度及其家庭政策的關聯，以統一後的德國為例，在婦女和兒童福利方面遭遇了兩個對立的理念與方法上的衝突。歐洲社區 (EC) 採用了嚴格的「不干預家庭內部工作的策略」。這個方法之不能通用於自由思想，正如不能適用於作

狹義解釋的補助金原理一樣。家庭和家政政策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認同和特殊性。

誠然正如德國個案有說服力的暗示，家庭價值與正在形成的有關私密性的態度，及國家的干預，皆源自於一個國家經常有害的歷史；舉例來說，在獨裁主義的政權中，私密性與個人的人格都將蕩然無存。這些來自歷史的痛苦教訓，這種「消極的特性」(Negative Property)，塑造後法西斯主義的婦女與家庭政策，以及促成了現代德國的婦女與家庭政策。從來沒有在西德推動過的由國家提供的全時間的兒童照顧在成為歐洲社區 (EC) 的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 中消失。

愛與責任的勞動作為「歐洲社區的非議題」(EC non-Issue)

有好幾次，作為「有酬」照顧的兒童照顧及「定時照顧」(Time to Care) 已列在歐洲社區的議程上。摩斯 (Moss, 1990:30) 主張，由於歐洲社區已承諾平等對待工作中的

男女兩性，對兒童照顧已有長期的興趣，可回溯到一九七四年的「社會行動計畫」(social action programme)。妄想使婦女有充分的機會均等，她們的工作模式需有改變，兒童照顧被設施需要增加，以及男人要有分擔家庭責任的在第一及第二平等機會計畫中，委員會非常積極地提出有點父母做與家庭理由假指令（後來因英國的否決而失敗），以及建立歐洲兒童照顧網。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社會憲章 (social charter) 條文，及施行文的「行動計畫」(the action programme) 敦促委員會撰寫兒童照顧建議案的草案。不過，由於這一建議案並不具約束力，因而流於「口惠而不實至」(cheap talk)。尤如歐洲兒童照顧網所示，一個修正的父母假指令或為「兒童照顧指令」(frame work directive on child-care) 仍無音訊。大會 (the concil) 正通過促使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繼續推動它。

各種有關老年照顧的正式（有酬）與非正式的全國性制度所受到的關懷並不大，雖然很多婦女為了照顧年老的父母已中斷或減

少她們的工作。委員會與歐洲法院 (The Commission and the Europea Court of Justice) 已不斷地聽任其會委員國當局自行決定是否，以及如何供應其「失去有酬工作」或不積極尋找工作者，及擔任無酬工作的人。

歐洲社區的不願干預大部分由於它的程序衝力 (procedural thoust)，以及未經由可以避免對可能結果作無休止爭論的權利。祇要沒有不當的歧視，政策的目的是要為某種結果的發展作較好的安排。如果別的地方有，則兒童照顧或老人照顧都包含在歐洲社區對「社會條款」的觀點中，也即解釋為改進其所有成員國的工作與生活條件。施行社會憲章的一九八九年委員會行動計畫明顯地稱老人為一個目標團體。委員會希望歐洲社區及其成員團，利用適合每一成員團的方法和工具，及足夠的資源與社會救助，向社會排斥 (social exclusion) 挑戰，藉以配合其公民——包括老人——的特殊情況 (Jamieson, 1990:32)。

一般而言，一位年老體弱的老人通常先

由近親、妻子、或丈夫來照顧（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個案）；然後再由女兒、女婿等親人照顧。如果這個人需要額外的照顧，她就必須——透過她的醫生——努力說明，她的病是可以治療的病。於是健康保險才會為她支付此一照顧所需的費用。有關健康保險付費的，有它所供應的疾病，及由老人自己付費，或者如果她是窮人，而由福利服務付費的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兩者之間是有嚴格區分的。如果疾病變成了慢性殘障，健康保險就不再支付任何費用了。子女與父母都有彼此照顧的法定義務。總之，這個解決方法不是「私人的」，就是「慈善的」……這些服務是不當的，以及大部分負擔都落在家庭的肩膀上 (Jamieson, 1991:114)。

一旦一個機構福利制度的社會安全系統與北歐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時，據說英國就走向一個自由的福利制度，包括可以利用平等的經濟權利向貧窮挑戰的「四肢正常的人」。柴契爾夫人 (Madam Thatcher) 所說廣為人知的話就能反映這一個觀念：「沒有像社會這樣的東西，祇有男人與女人，以及

由他們所組成的家庭。」雖然家庭和政府都可以作為最後的手段，支持那些並非因自己有錯誤而面臨危險的人：小孩、殘障者、病人、或老人。由各種照顧制度及其基本原理來看，我們可能預測參與勞動市場的性質，尤其是已婚婦女的參與。那些非常依賴家庭及婦女無酬照顧的國家都期望婦女要依靠男性負擔家庭生計 (Lewis and Ostner, 1992; Lewis 1993)。

假定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存在，女性與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模式就應納入歐洲社區成員國的各種福利典章制度中。當大多數國家認同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同時，婦女在不同程度上都被侷限在管家與母親的角色上，或是一已已婚婦女與母親——也視為工人。Lewis 將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區分為：「強度的」、「中度的」、及「弱度的」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

因此，英國、德國、及荷蘭都是「強度的」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國家。它們都認為，成年婦女在社會權利方面都是依賴維生的妻子。但是它們在發展促進婚姻與家庭生

活的政策、移轉 (Transfers)、及服務方面都各有程度上的差異，固而補償了婦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勞動市場中所遭遇到的危險和不利。法國不斷地承認及促進婦女仍是妻子、也是母親、更是工人的地位，因而被分類為「中度的」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國家。當家務事依然被用來測定需要的單位時，家庭成員的角色在程度上就有別於強度的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國家中的家庭成員的角色。家庭及其成員都被視為社會政策所促進的「團體中的個人」 (Corporate Individual)。丹麥被分類為「弱度的」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國家，所以在丹麥、一九七〇年時，婦女已被定義為工人而非妻子和母親。Lewis 認為，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模式的優點或弱點，連同補助金或「自定」模式的優點或弱點，都被作為預測指標 (Predictors)，預測婦女在社會安全系統中所受的待遇，社會服務供應的水平，尤其是有關兒童照顧及其參與勞動市場的水平，因而德國被視為一個高度社會保守的國家。照顧和負擔家庭生計者的制度也可以測定，歐洲社區

的成員國如何將政策推行到全國。歐洲社區成員國對「誰該最先受到照顧」的問題所作的回答都各有不同，雖然大多數成員國都依靠「補助金」的原理。德國的家庭政策在傳統上是依賴補助金，也就是指家庭的基本義務，完全有別於社會主義的東德。

補助金、團結、及平等 在西德的差異

當強調制度的神聖性與人類關係的內在價值的同時，受到浪漫的和反契約性的及社會與天主教概念所影響的德國婚姻和家庭政策已為獨立個人的現代理念沖淡。這些概念塑造了一九〇〇年德國民法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中的婚姻與家庭法，也影響了西德一九四九年憲法中的德國基本法 (Grundgesetz)，其中的某些部分持續推動了戰後的各種改革，也成為某些立法的基础。法律的保障，個人的自由，及倫理制度的神聖性，都已成為家庭法中的原則。它們絕不是無用的，因為它們依然導引立法（例如在最近憲法法庭對墮胎的裁決）。因此，

它們應該受到人們更多的注意。

每個人在婚姻中受到的法律保護，在傳統上是指夫婦雙方的義務，甚至包括雙方同意的分居。這一法律保護暗示，夫婦中的一方是極易受到傷害的，尤其是在分居的個案中。直到第二原則——個人的自由——在一九七七年所作的改革解釋時，法律才站在失望者的，也是最易受到傷害的那一方。爲了這個緣故，有關極端的自由概念被否決了，因爲它容許配偶中的一方憑著單方面的武斷「解決」婚姻。換句話說，立法者都認爲婚姻的神聖性應該是最重要的信條。

此外，祇要由於家庭與個人互動的結果，依賴的抉擇已被視爲對後代子孫的唯一供給者，而且來自社會的幫助不是不大，就是毫無幫助時，由類似獨立個別行動者的市場所構造的「世界觀」，對深受社會與天主教教義影響的德國，就顯得陌生了。換句話說，個人已被視爲連續深植在男女兩性與這代人（子女或父母；妻子或丈夫；更基本地乃是男性與女性）的垂直與水平關係中。甚至單方面個人依賴的模式中，親戚關係仍

被視爲依賴者不太能控制的、基本的和必要的人類條件。性別差異（雖然平等）角色的重要性，這些角色的相互關係，以及婦女在社會關係中共同的，但卻又非明顯「自然」隸屬的關係在傳統上受到了強調。因此，社會與天主教家庭政策鼓勵婦女實現她們的潛能，以不同的義務和職業，說出不同的，但卻又平等的生活。因此，政策應該尊重補助金的原理（較少單位的優先順序應超越較大的社區或國家）。

遵循此一補助金原理的社會與家庭政策受到文化假定的引導：誰在做提供照顧的工作，以及什麼原因促進他們做那一工作。由誰提供照顧的問題一定與照顧所需的時間和空間，就業，以及有酬、無酬工作的性別區分的問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有關誰是主要提供照顧者問題的保守的答案各有有限的差異，雖然大多數的答案都是基於補助金的原理。也就是說，這個需要照顧者的嫡系近親就應該提供此一照顧，倘若不是兒童照顧，母親要比其他家庭或成員更應該提供此一照顧。一般而言，公共的協助在本質上就是補

助金。除了主要的照顧提供者，由其他團體提供的任何家庭干預都是正當的。Somn-ers (1992) 解釋爲「孝道」(filial moral obligation) 的「不同拉力」的原理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t Pull") 也是流行的)。她爲不同和均等拉力作了一個區分。以均等拉力爲基礎的義務已納入（總稅收爲主的，General Revenue Based）普通服務福利國的概念中。所有的公民都應受到有關其需要的平等對待和平等分配。在比較上，「不同拉力」是有關以照顧提供者與受益人兩者關係爲基礎的社會與道德義務。

在社會與天主教，更進一步地說，在基督教民主思想中，補助金的原理都依靠較廣泛社區的團結，也基於能容納多數利益與觀點的連續社會對話 (Neil-Brenning, 1957)。一個社區的團結是受到歡迎的，有時也是支持特殊照顧提供關係所不可或缺的（例如母親與子女的經濟支持），祇要這一支持可以擴大，而非取代親子之間的關係。

有關親戚關係的個人主義，補助金，及差異中有平等的概念都深植在傳統的歐洲思

想中。此外，親戚關係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差異中有平等的哲學都已影響了歐洲大陸的女權主義(Feminism)，尤其是在法國，義大利，及德國更是如此。那些深受親戚關係個人主義影響的女權主義者都批判個人或平等中的性別差異，因為女權主義在這方面受到了低估(Cora, 1991:133)。她們主張，「在本質上」，女人與男人在身體方面是有差異的；這些(異體化的)差異影響了女人和男人認知，以及他們生活的方式(Offen, 1988)。

有關有價值的制度，補助金，尤其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重建期間更是如此。以這些概念為基礎的家庭政策已經特許男性負擔家庭生計者／女性家庭主婦的婚姻模式高過任何其他模式，加強男性在高度動力和過分要求的經濟領域中的作為和優勢，以及建立一種男人的規範，也即男人擔任有酬工作，及在下班後回到家裡，以及女人在家操作家務，等待負擔家計的丈夫下班後回家。同時，有關連續工作者的國家支持的保險計畫的所得已有改善，包括家庭

所面對的危險(例如像負擔家庭生計者的患病或死亡)。社會保險計畫表面上是完全支持補助金的原理；戰後所提有關普遍公民為主計畫之建議案已遭否決。

在一九六〇年代，德國憲法法庭主張，家務事和就業是不同的，但是它們都是有價值的；因此，年金計畫應將某些價值附加在婦女在家中所做的無酬工作上。一九八六年的兒童撫養立法(Child Rearing Legislation)就回應了憲法法庭的主張，因為它使在家中照顧子女的婦女獲得年金的權利。雖然以性別中性的語言起草，這一政策是正確的，至少它使從事家務母親的低下地位與有特權的職業婦女的地位兩者有了平等(Ostner, 1994)，並且已為德國婦女廣泛認同。批評者的言論祇是圍繞著附加在從事此一照顧的全國人數上打轉。

在查看最近的就業統計和小組資料(Panel Data)時，Landenberger (1991)及Schulz and Kirner (1992)都認為，照顧者與母道(Maternity)政策已減除了勞動市場中的程度是剩餘勞力，否則那些人就失業

了。他們指出，父母假的程度是有彈性的「出與部分時間再進入的機關」(Exit-and-part-time-Reentry Mechanism)，使勞動市場中的結構性限制轉變成為各類婦女勞工與非勞工需要解決的婦女問題。此外，這個計畫的運作是以老年計畫，及擴大公共兒童照顧的政策為代價，也犧牲了人數日漸增長的需要全天工作的單身婦女和母親(Ostner, 1993: 102)。幼稚園，流行的兒童照顧設施，都是特有的教育機構，但是它們的設立絕非為了協助父母更有效地組織家庭和就業。基本上，這些機構祇收容三歲以上的兒童，在午餐前受到數小時的照顧。

東德的社會主義者的 "etat Providence"

在一九五〇年代，西德的重建在很多方面似乎是德國歷史和信仰的連續。因此，「恢復正常狀態」(Regaining Normality)是指挽回和復興在納粹時代摧毀的與扭曲的固有歐洲傳統。在這一方面，Arendt (1989: 26)認為，納粹主義就是歐洲傳統的虛妄衰

敗。在戰後，東德的社會主義唯一黨 (Socialist Unity Party) 也在探索回歸基本的德國傳統，而非「革命勞工運動」的，尤其是德國共產黨所需之新政治秩序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和平等主義的推力 (Winkler, 1989:26-7)。東德反法西斯主義有意將納粹政治和中產階級政治合併。結果，這些政治活動拒絕了民間文化中的自由和政治參與的權利，而無太多的思想，能使取消中產階級特權和廣泛促進勞工物質平等的意願受到了強調。

重建一九四五年後的東德必需促使所有婦女投入全天的就業。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的初期，兒童照顧設施已無法滿足實際的需求。社會主義的東德及西德社會市場經濟與經濟的必需性之間的競爭，以解放的方式，刺激了經濟獨立的概念。結果，在一九六〇年代，以母親與子女為取向的政策，例如享用日間照顧的餐飲及母親假相繼施行。每位婦女都有權利每月享有一天的假期，專門做家務事。她們在孩子出生後的第一年也有權利要求有酬產假。鼓勵生育的政

策 (Pronatalist Policies) 支持有兩個以上子女的母亲，所以這些政策規定，她們可以享受延長的產假，以及減少退休前所需的工作年數 (Bast and Ostner, 1992)。

此類政策協助婦女參與就業的行列及將子女安置在公共照顧設施中。在東德終生從事工作的婦女人數要比西德多得多，而且她們在家庭以外所花的時間也非西德的婦女所能比擬，大多數東德婦女除了上下班花在車上的時間外，每週要工作四十三小時，同時，她們平均要擔任全天工作三十五年，也非西德婦女工作二十五年所能比較。社會主義黨或公司都定期為孩子們組織休閒，及非常便宜的學校假期活動。決定兒童未來的是國家，而非他們的父母，例如像兒童的入學與職業訓練，工作分發，及進入工作場所等均由國家決定。東德的婦女有較高的結婚率；她們結婚，並且很快就會有孩子，大多數婦女在二十與二十五歲之間就生兒養女了。

東德於一九五〇年通過了「兒童與母親保護及婦女權利法」 (Law on the Protec-

tion of Children and Mothers and on Women's Rights)，正式消除了婦女的經濟依賴，因而也取消了男性負擔家計者才是一家之主的想法。此外婦女終生操持家務及擔任妻子角色的觀念也隨之消退 (Ostner, 1993:108)。然而除了同樣的訓練，婦女幾乎很少喜歡相同的工作機會和所得；大多數家庭都需有雙重的賺取所得者及依賴給予家庭的「實物給付」 (Benefits in kind)，例如免費的日間照顧，及補助兒童的服裝和食物。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及供給一些奢侈品，像汽車、家電用品等，婦女們必須有一些額外的所得。

尤其是在柏林圍牆於一九六一年建立以來，東德有了相似的傳統社會：一位社會主義者 (Gemeinschaft) 是基於團體的類似性，而非異樣性與個別性，使每一個人在「假性親族網」 (Quasi-Kin Network) 享有社會福利。在面對他的時候，社會主義德國（在圍牆的後面）已充分地發展了婦女的個人主義和獨立，個人稅捐、少數寡婦年金，自由選擇生活安排，以及沒有法定的家庭義務。天

佑的社會主義國家及公司已成為兒童照顧的提供者，也為老人安排照顧。政府機構及工作人員也按時照顧退休的人員 (Melbeck, 1992:10)。直到一九八〇年代の後期，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的照顧關係才變成經常的和社會化的模式。

將社會主義的代表性再擴大一點，就像在傳統的社會中一樣，東德繼續保持工作與任務的傳統的性別隔離。當照顧工作的性別區分在大多數西方社會中一再受到質疑的同時，社會主義的東德，就像歐洲社區中的其他東歐集團一樣，都期望婦女劃分她們之間的照顧工作。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末期，倘若父親們能提出良好的理由，他們就有權利要求親職假。東德的社會和政治系統有意防止以西方民主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公私二分法。它妨礙了公民、工人、及家庭成員的分離角色的發展，因而間接地造成了「包括一切在家中的」文化。工作場所和家庭之間的界線仍然模糊不清；職業與個人角色也仍然重疊。用社會學的語言可以解釋成社會主義的德國很顯然不太有差異性，反而是非常同類

性的 (Gemeinschaft Like)，同時，不會促進或容忍太多的多樣性 (Moll and Schuster, 1992)。

婦女與福利爭論在未來的不定性

除了歐洲社區的離手方法，摩斯 (Moss) 提到「歐洲社區委員會」中的更突出的兒童照顧，以及他似乎假定，如果英國不否決，例如依照合格的多數提案規則，親職假指令 (Parental Leave Directive) 都可以通過的。然而，事實上有很多理由可以說明，這個觀點似乎是過分樂觀了。

第一，我們必須考慮歐洲社區的特殊政策過程。正如歐洲社區的政治家所表達及 Moss 所引用的政策觀點並不能總是反映實際的政治利益。它們已成為一致規則與英國必然否決所促成的 (Lange, 1992:250)。沒有人會真的希望對家庭的觀點及兒童照顧問題能認真的影響歐洲社區及其成員國立法。有關某些社會政策方面的最近所作合格多數表決的改變，及英國不願放棄社會政策

方面的主張，都已使政策過程變得更為複雜。反之，決策者必須透明化，及尋求盟友在艱難的過程中結盟。如果不能立刻結合就業流動性關係，家庭與照顧問題就會進一步地邊緣化 (Marginalised)。因此，若是依據歐洲社區對未來立法所說的話來推測，那就太天真了，這正如委員會中很多報告中所說的一樣，它沒有適切指出政策過程中內在的障礙的關係。

第二，並非所有的成員國都支持明確的家庭政策，而且也沒有訂立有關親職假的規定。一個有關訂立限制親職假標準的指令不平常地「搶先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規則，抵觸了補助金的原理，也嚴重地腐蝕了一個成員國獨立設計自己措施的主權，倘若那些措施都不帶有歧視性。此外，以改進職業婦女工作情況為目標的親職假與其他家庭政策，對婦女而言，經常都是「重複的」(Gannus-headed)。在各種負擔家計者及照顧制度的體系中，這些政策都應受到嚴格的審查，因為它們是複雜的，而非單獨的問題。正如德國的例證所示，它們可以用來創造一個有彈

性的、特殊的雇員類別，也就是說，它是指正在工作或正在尋找工作的婦女，包括那些決不會要當母親的婦女，因而間接地對所有婦女造成歧視。

自德國統一後，日益顯著上升的失業率及區域之間的差異，最近都支持多重速度的政策，或者從東德的觀點來看，也即「落後」的意思(Lagging behind)。到目前為止，老練的決策者及工會都在竭力鼓吹「團體勞工法」(Non-standard Employment Contracts)對那些長期失業及正在找工作者有利。Schorpf(1993)支持基本所得與不固定工作合併的「胡蘿蔔與棒子」的政策(Carrot and Stick Policy)。劇烈的經濟重建可以使任何綜合政策改善有關部分時間及其他典型式的工作的規定，或是更廣泛地說，將使「有」(持有良好的工作)與「無」(強迫擔任不好的工作)兩者之間不太可能有重大的再分配。此外，由於非標準的就業模式已日漸成為男性的模式，婦女就很難證明她們受到間接的歧視。事實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是不會贊同那些支持婦女

自由與社會權利的優良的家庭政策。

(本文作者現任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

- Ellwood, D. 1988 *Poor Support*, New York, Basic Books.
- Fraser, N. 1989 *Women, Welfare, and the Politics of Need Interpretation*, in N. Fraser(ed.), *Unruly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44-60.
- Hoff Sommers, C. 1992 *Filiale Moralität*, in G. Nunner-Winkler, (ed.) *Frandfurt, Campus*, 284-305.
- Jamieson, A. 1990 *Care of Older Peopl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L. Hantrais, S. Mangen and M. O'Brien(eds.), *Caring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1990s*,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apers, 2(3), 32-45.
- Jamieson, A. 1991 *Community Care for Older People*, in G. Room, (ed.), *Towards a European Welfare State?* Bristol, SAUS, 107-26.
- Lewis, J. 1992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2), 159-74.
- Lewis, J. 1993 *Introduction: Women, Work, Family and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 in J. Lewis, (ed.), *Women and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 Work, Family and the Stat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14.
- Lewis, J. and Ostner, I. 1992 *Gender and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Regimes*, Working Paper 7/19. 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Research, Bremen University.
- Moss, P. 1990 *Childcare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L. Hantrais, S. Mangen and M. O'Brien(ed.), *Caring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1990s*, Cross-National Research Papers, 2(3), 23-31.

Ostner, I. 1993 *Slow Motion: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in Germany*, in

J. Lewis, (ed.), *Women and Social Policies in Europe. Work, Family and the Stat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92-115.

Ostner, I. 1994 *Back to the Fifties: Gender and Welfare in Unified Germany, Social Politics*, 1(1). Paterman, C. 1988 *The Patriarchal Welfare State*, in A. Gutman (ed.), *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1-60.

Peters, G. B. 1992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A. M. Shragia (ed.), *Europolitic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75-122.

Sjerp, I. 1988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in the Netherlands: Demands of the Dutch Women's Movement*, in M. Buckley and M. Ander-

son (ed.), *Women, Equality and Europe*, Houndmills, Macmillan, 95-106.

台北市婦女服務機構舉隅

1. 台北市婦女會（緊急庇護）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十一巷六號
電話：三九五—〇五二
2.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婦女成長、環保推廣）
地址：台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六〇巷二號四樓
電話：三六八六二—一
3. 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離婚、喪偶服務）
地址：台北市博愛路一巷一號四樓
電話：三八一九七六九
4. 台北市家庭教育服務中心（心理、婚姻與家庭輔導）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三段二十五號二樓
電話：七七二—八八五・五七八—八八五
5. 台北市勞工婦女協會（職業婦女服務）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九號十二樓
電話：三九六八五一六